

“双减”政策下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与保障

李彦龙¹,常 凤²

(1.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2.哈尔滨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摘要】在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背景下,国家对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及规范课后延时服务做出最新部署。体育作为课后服务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应有之效。以“主体—客体—内容—手段”为逻辑主线,分析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及现实困境。研究认为,师资力量薄弱遏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体供给、运动安全顾虑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客体参与、内容单一阻滞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全面均衡发展、支持手段有限阻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社会联结。研究提出,实现多元主体支持,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扫清障碍;提升客体主观能动性,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参与提供行为动力;丰富内容体系,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均衡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改善支持手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实现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等保障策略。

【关键词】“双减”政策;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中小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师资;学生体质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2-0033-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1201.001

我国中小学近视检出率为53.6%,视力不良问题已被WHO纳入“视觉行动2020”计划^[1]。同时,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也是21世纪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2]。大量研究证实,近视与肥胖问题主要与缺乏体育锻炼有关,而过重学业负担是导致青少年缺乏体育锻炼的关键核心因素。面对广大青少年健康危机,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为减轻青少年负担,国家先后出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文件。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对修复教育生态,保障每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政策保障^[3];要求“提高课后

服务质量”,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别化、实践性学习需求;提出“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的要求,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021年秋季开学以来,上海、江苏、安徽、陕西等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包括作业辅导、体育、科学、阅读、艺术、心理游戏、静心阅读、伙伴交往、师生谈心、科普活动、劳动实践、电影观赏等内容的校内课后服务^[4],时间大多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时长不少于2h,即“5+2”^[5]。然而,目前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还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运动风险顾虑、服务内容单一、支持手段有限等困境,表现为不重视、参与低、内容少、时间短、效果差,呈现出复杂性、广泛性、低效性等特征,降低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对中小学生的体魄锻炼和人格塑造发挥

收稿日期:2021-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TY057)。

作者简介:李彦龙(1979—),男,黑龙江五常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运动健康促进。

通信作者:常 凤(1979—),女,黑龙江五常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运动医学。

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双减”政策下,减轻学业负担,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迫在眉睫,保护中小学生健康刻不容缓。本课题在梳理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基础上,探析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的现实困境,提出保障策略,旨在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改善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

1.1 课后延时服务的生成逻辑

课后延时服务,也称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首次出现在教育部办公厅2017年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是为了解决家长因工作时间与中小学生放学时间不同而引起无法及时接送学生的问题所产生的一种服务。课后延时服务是指为促进学生健康发展,解决放学后部分学生接送难、无人照管的问题,在正常教学活动结束后,以学校为主体,以中小学生为客体,利用学校资源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延时服务^[6]。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传统“大家庭”结构调整,“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例达43.7%^[7]。“双职工”家庭比例越来越高,家长无法兼顾放学后子女的接送和陪伴,导致学生放学后“无人看管”,“三点半现象”愈来愈严重^[8]。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义务教育学校开设“晚托班”,以帮助家长承担放学后的看管与监护。因此,有效解决“家长接送学生难”的问题成为课后延时服务的生成逻辑。

1.2 课后延时服务的动因逻辑

课后延时服务是实现“双减”政策落地的一项重要措施。首先,课后延时服务可以减少中小学生因无人看管引发的意外事件,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亦可以利用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活动内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个性发展、提升核心素养,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后延时服务的宗旨是服务家长,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增多,达1550万余名,留守儿童的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比例为70%^[9]。通过课后延时服务可促进资源协调发展^[10],发挥好体育场、音乐室、美术

室等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减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盗窃、自残、早期性行为等现象。此外,低收入家长儿童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开发和培养体育、音乐、艺术等方面的兴趣。最后,随着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规范课后服务工作,各地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课后延时服务,涉及科技、艺术、体育、民俗民风、影片观摩、劳动技能等内容,可以满足学生休闲、娱乐、个性发展等需求,并有助于提升综合素养,实现职业期望。报道显示,中小学生主动自愿参加课后延时服务的比例较高,部分学校甚至达100%。因此,学生全面发展需求是课后延时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

1.3 课后延时服务的演进逻辑

雏形阶段。我国课后服务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1],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家长与学生放学时间的冲突,导致部分儿童放学后无人看管,引起社会关注。因此,部分义务教育学校开设“晚托班”“课后托管”,成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逻辑起点。随后,市场经济的介入,商业化校外机构的“看护”“提供学习场地”“代接送”等业务陆续出现,并逐渐演变为“课外辅导”“兴趣补习”。学校附近小区的一些民宅,“看护班”“小饭桌”在这一阶段兴起。这一阶段,无法清晰直观地界定支持主体,既有学校,也有机构、家庭,服务以看护为主,作业辅导为辅。

发展阶段。200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出台,加强学校收费管理,禁止乱收乱支(图1)。该意见进一步规范部分学校“晚托班”收费。2009年,《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强调不得占用学生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和集体补课,该文件对学校“晚托班”产生影响。2014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直指学校的有偿课后服务。2015年,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对课后服务产生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有偿课后服务在校内的存活空间受到政策限制。各地市为落实国家政策要求与满足学生及家长现实需要,陆续出台地方文件,规范校内课后服务收费及服务内容。如广东、辽宁、湖南等20个省份采取政府

和学校、家长联合分担经费的方式,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吉林、天津、上海、北京、福建、贵州、河北、山西则提供免费课后延时服务^[12],进而形成地方先行,

各具特色的课后延时服务。基于此,系列政策的先后出台成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的制度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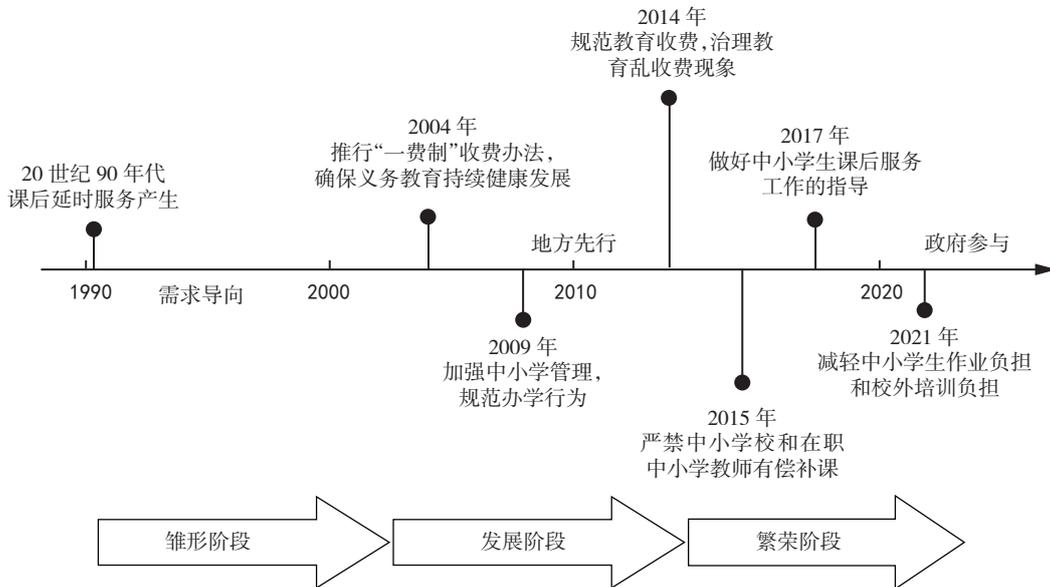


图1 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的历史进程

Fig.1 Historical proces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繁荣阶段。2017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课后服务做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全国25个省市出台地方意见。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正面回应了“三点半现象”的困境。2021年7月,《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进一步规范了我国课后服务,为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提供有力保障。由此可见,“减负”成为我国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的行动逻辑。

2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

“双减”是国家站在时代高度的战略安排,是治理过重学业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就国家视角而言,“双减”政策明确要求加强体育锻炼,为学校体育广泛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就社会视角而言,通过“双减”形成减负共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教育问题,为学校体育发展增添生机活力;就学校视角而言,“双减”政策有助于深化学校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改变过于倚重智育,而忽视体育的教育不均衡现象,对加快推进“体教融合”,促进学校体育深入发展,提升学校体育的战略地位具有积极作用;就

家庭视角而言,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提升家长对体育的认可度,激发学生学校体育参与热情。由之可见,“双减”政策为学校体育发展带来新机遇。

《意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和质量提出要求,强调开展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体育是课后延时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运动深受学生的青睐,成为中小学生热衷报名的内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指学校利用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积极引进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为学生全面发展和满足个人需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课后与体育培训机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13]。众所周知,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效用,需要时间作为基础保障。每次运动时间、运动强度及运动量只有达到有效阈值,才能达到立德、育智、强体、审美、尚劳的效益。因此,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应达到一定时间,并在一定时间产生一定效用。然而,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仍存在以下困境。

2.1 师资力量薄弱遏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体供给

目前,绝大部分学校的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由学校体育教师承担,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存在主课教师

多、副课教师少的问题^[14]。就供给侧而言,社会支持的实施者数量少,势必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供给质量。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仅653 055人,体育教师存在巨大缺口^[15]。如上海目前中小学在校学生约130万人,体育教师仅1万多名,师生比约1:130。按体育课程改革要求,最适合的体育师生比为1:100。那么,上海市中小学需要1.2万~1.3万名体育教师,缺口约20%^[16]。与英国(1:8)^[17],芬兰、丹麦、挪威(1:10~1:20)^[18],澳大利亚(1:11)^[19],存在巨大差距。体育师资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课后再开展体育服务,势必影响效果。师资力量薄弱的原因有:①体育教师入职、入编门槛高。特别是对于退役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水平及学历较低,而入职学历要求高,考编难度大^[20],致使高水平运动员队伍对中小学教师岗位只能望而却步;②重文轻体的传统惯习,导致在教师总数的限制下,体育教师指标被语数外等主科目占用^[21];③体育教师社会认可度低,污名化现象严重^[22],相对主科目教师职业地位低,工作收入明显少于主科目老师。

2.2 运动安全顾虑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客体参与

体育运动既有增强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也存在运动风险。特别是在足球、篮球等直接对抗性项目中,队员之间难免出现推、拉、挤、打等过分动作,引发运动性损伤。这些事故不仅给学生带来身体的伤害,而且给学校、体育教师、班主任造成不良影响,激化学校与家长的矛盾,很多学校因此不敢放手开展体育课程。存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走过场、效果不乐观等情况^[23]。如课表上安排体育课,但实际实施时,则由其他可在教室内完成的课程代替。其原因在于:①部分中小生活泼好动,勇于尝试,敢于冒险,但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24],易引发运动安全问题。②学校缺乏运动安全保障制度或执行效果差,缺乏完善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的法规和管理制度体系^[25]。③部分中小学场地、器材、服装等达不到国家标准^[24],存在安全隐患增加学生运动风险。④体育教师数量不足,无法兼顾到全体学生。导致体育教师擅离职守、未对学生进行保护、未尽到义务、未及时告诫或制止危险行为等现象时有发生^[24]。⑤部分家长过分溺

爱孩子,运动引发的轻微损伤或不适,就会向学校反映,甚至制造不良舆论,要求学校或教师负全部责任,学校、社会和家庭关系紧张^[26],校方开展体育服务如履薄冰。

2.3 内容单一阻滞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全面均衡发展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北欧等发达国家的课后服务开展较早,发展程度较高,在世界享有赞誉,可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美国的课后服务纳入亲子活动、劳动技能,对学生进行潜在的体育教育^[27]。英国加入志愿或商业活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并确保青少年每周参加1~2项高质量的体育比赛。丹麦、芬兰、瑞典、挪威,重视儿童青少年冲突处理、劳动技能锻炼能力培养。日本积极调动社区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学校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28]。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包括校内阅读、自习、做作业、社团、兴趣小组活动、劳动实践、体育训练、艺术审美、观影观赛、心理游戏、伙伴交往、师生谈心等内容。

2021年7月,“双减”政策颁布后,我国各地区积极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规范该项工作。其中,北京、南京、长春、深圳等地对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提出明确要求,如30 min、1节课或1 h等。上海市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广州市对托管总时间进行规定,浙江省课后服务还增加免费“线上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由此可见,各地市按照《意见》要求,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课后延时服务,基本覆盖体育内容,但仅少数省市对体育锻炼的具体时间进行明确规定,我国中小学体育课及课后延时服务主要设置田径、三大球及体质健康测试或体育中考项目,缺少学生们喜爱的羽毛球、跆拳道、游泳、体育舞蹈等课程。报道显示,武汉市小学生有专人指导的文艺体育科技服务占10.7%^[29],2/3学校课后服务时间为1 h,1/3为2 h,个别仅30~40 min,学生体育服务时间短且难以保障。

导致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单一的原因包括:①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由于部分乡村学校有篮球架、没有篮球场,有足球门、没有足球场现象屡见不鲜,很少配有羽毛球馆、游泳馆、形体房等^[30],导致多数学生喜欢的羽毛球、游泳、体育舞蹈等项目,因场地设施不足限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有效开展。基

于此,部分学校将课后服务转向作业辅导,甚至文化课教师上课、考试、讲解试卷,将课后服务转为变相的教学时间;②体育教师师资不足。有限的体育师资力量多集中于体育中考项目,限制课后体育服务多元化内容开展,导致大部分学校开设的课后体育服务内容不受学生欢迎,从而降低了客体参与的积极性;③我国应试教育制度中体育占比低,而且不易拉开分数^[31],部分学校对体育重视不够,课后体育服务内容受限。

2.4 支持手段有限阻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社会联结

支持手段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是架设在社会支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支持手段的工具选择取决于支持内容,支持内容越丰富,支持手段越多。反之,支持内容越单一,则支持手段越有限。有限的支持手段势必阻碍支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客体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欲望降低,心理评价差,导致课后体育服务效益无法达到预期。实践显示,多主体在“双减”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学校形式上坚决支持国家“双减”政策方针,实际上无论是物质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手段皆十分有限,缺乏实际的、能体验到的、情绪上的积极支持。

大部分学校基于提高“升学率”的目标驱动,课后延时服务中仍然坚持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课程辅导及作业布置,而课后体育辅导较少;主科社会培训机构则利用节假日及课后时间,转入地下组织培优活动,而体育培训机构服务水平有限;大部分家长对“双减”后加大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表示支持,但也有少部分家长对课后体育服务质量表示担忧;此外,部分成绩差生家长利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更倾向于高价聘请私教为孩子培优补差,而不给予学生参与体育的物质及精神支持。有限的支持手段源于:①家长对体育的认可度存在明显差异^[32],部分家长存在“唯分数”的认识误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分数高”,形成“重分数轻体育”的惯习误区;②对孩子未来发展与就业压力的担忧,致使部分家长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支持度较低,限制学生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降低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

3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的保障策略

体育强则中国强,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体育对改善中小学生体质状况,减少近视发生率,降低肥胖率,预防慢性病,增强意志品质,改善不良情绪,培养遵纪守法行为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聚焦“减负”,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至关重要。“双减”工作是一项多主体、多手段、多元化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的“协同减负”。基于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体、客体、内容与手段的现实困境,提出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的保障策略。

3.1 实现多元主体支持,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扫清障碍

多元主体支持是“减负”的有力保障,是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有效开展的必然选择。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最重要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教育活动的开展是在各地市的教育局、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现,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接受教育部的统一指挥。《意见》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因此,形成政府、学校、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家庭、志愿者等多元化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主体,其中,政府支持是主导,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非政府组织则可利用自身优势辅助国家对弱势群体实施社会支持。

当前,我国很多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存在运动安全顾虑、师资力量不足、场地设施有限、服务内容单一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支持,将为解决这一困难提供出路。①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体育教师。中小学校可与体育院校、综合类大学或运动队合作,吸收体育或医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及运动员,补充体育师资^[33],动员更多主体参与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工作。同时,强大的师资可以传授更丰富的运动安全防范知识与技能,提高中小学生识别、预防及规避运动风险的能力,减轻中小学生及家长的运动安全顾虑;②鼓励中小学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或场馆等第三方合作^[34],动员社会主体参与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解决学校师资和场地设施不足的问题。学校可就近与学生热衷项目的体育培训机构、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等建立联系,开展学生喜爱的游泳、跆拳道、羽毛球等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质量;③随着国家对全民健身设

施投入的加大,基层社区场地不断完善。可借鉴日本经验,鼓励中小学打破学校界限,充分调动社区力量^[28],动员社区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离退休体育教师等社区主体,以社区为单位开展中小学生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3.2 提升客体主观能动性,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参与提供行为动力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客体为全体中小学生在。保障体育服务的时效,离不开客体的积极参与和主观能动性。研究表明,青少年每天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时间控制在60 min以内对学业成绩提升具有显著增益效应^[35]。之所以具有增益效应,是因为体育对注意力、观察力、思维力均具有提升作用,可促进智力发展;体育具有维持个体良好情绪和身心健康功能;体育是提高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仅5.3%达到了WHO所规定的参加60 min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一方面,源于学习任务繁重,课业较多,中小学生在学校教育静态规训之中,动态的生命活力反遭鄙视和不屑^[36];另一方面,在强大的电子媒介技术攻势面前,部分中小学生在彻底沦陷于游戏、短视频、动画片等虚拟的网络世界^[37]。

鉴于此,可通过以下措施提升客体主观能动性:
①有效落实相关政策,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增加体育锻炼时间。“双减”政策要求各类机构不得利用寒暑假、休息日等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优活动,明确要求课后延时服务内容中包含体育训练,予以客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政策保障。《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等规定各平台网络游戏仅在周末20:00~21:00面向未成年人开放,这一举措对限制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具有积极作用,对间接提高客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起到一定助力作用。因此,家长认真履行监护人职责,监控中小学生在适度进行网络游戏,鼓励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熟练掌握1~2项运动技能,有助于提高中小学生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参与的能动性。
②尊重学生的体育兴趣爱好,支持主体为客体提供丰富的、可选择的体育课程,激发中小学生在体育参与活力。其中,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做人教育、生活教育和养成教育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家长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运动技能指导能力、运动支持度等对学生养成运动习惯至关重要。因此,提高家长群体体育参与及支持度,是提高中小学生在体育参与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3.3 丰富内容体系,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均衡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我国课后服务内容涵盖作业辅导、体育、艺术等,但仅北京、南京、长春、深圳规定了体育服务的时间,关于服务的具体内容则无明确要求,进而导致部分学校课后体育服务不开展体育活动,或者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练习,或者进行体育中考项目的训练。仅少部分学校调研学生的需求和喜好,开展课后体育服务。因此,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时间和内容参差不齐,效果难以保障。可通过以下措施丰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体系:
①学校应研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标准,对体育服务的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在形成多元主体支持的前提下,不断拓宽体育服务内容,打破年级、班级界限,以学生兴趣为依据,提供学生需要的、喜欢的体育课程,进而激发学生参与体育的热情,帮助儿童青少年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此外,体育服务内容要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生理学特征,低年级以体育游戏为主,培养体育兴趣;高年级进行运动技能的传授,支持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技能指导,普及体育运动技能,做到教会、勤练、常赛^[38]。
②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方面注入情感支持、工具支持、讯息支持和友伴支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39],从源头上解决减负增效问题。情感支持是指支持主体对客体表示友爱、关怀、同情、了解和信任,是社会支持的核心成分。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肯定性的鼓励、关心和爱护。工具支持是客观的、可见的实际支持。如中小学生在参与课后体育服务中使用的场地、设施、经济支持等。因此,丰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需要支持系统主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家长给予经济援助。讯息支持指通过纸质或电子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学校、社区、家庭除给予运动技能传授外,还可为中小学生在提供适当的体育信息,使学生了解体育在强身健体,增强意志品质,改善情绪,促进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友伴支持是指根据共同爱好结成友伴,形成“友伴群体”,共同完成活动任务。在丰富体育服务内

容方面,可利用“友伴教学”,提高学生团队意识和责任感。

3.4 改善支持手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实现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改善支持手段就是从方法上解决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关键技术问题。具体措施为:①课后延时服务作为一项利民政策,通过政府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在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扶持的情况下,各学校应积极争取社会支援,鼓励校友或社会企业捐赠,成立专项基金,用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②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施过程中,适当给予学生物质或精神鼓励,有助于促进学生持久地参与体育运动。可采取计时的方式,制定奖励办法,每月、每学期、每年累计达到一定时间,颁发奖状、奖杯或学习用品,并张贴荣誉榜,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体育。③除需对客体改善支持手段外,也可通过对主体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的方式,实现体育服务精准化供给^[40],鼓励更多志愿者、企事业单位参与课后体育服务工作,特别是师资力量薄弱、场地设施匮乏的农村中小学,政府部门可给予相关机构一定经济奖励或荣誉鼓励,个人所在单位对积极参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社会服务的人员,在年度考核、晋升、绩效分配等方面给予政策、物质及精神支持,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中^[40],形成校内外联动机制,提升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质量。

4 结论

“双减”政策是国家为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切实提升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无疑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革命性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研究认为,课后延时服务的生成是为解决部分家长接送学生难的问题,其动因是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其演进经历雏形阶段、发展阶段、繁荣阶段。“双减”政策强调体育是课后延时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时效差,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运动安全顾虑、服务内容单一、支持手段有限等现实困境。研究提出,以学校为主阵地,配足配齐体育教师、传授更丰富的运动风险防范知识

与技能,不断提升中小学生体育参与的能动性、研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标准,丰富内容体系、改善支持手段,提升支撑保障能力等措施,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18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过半[EB/OL]. (2019-11-06)[2020-11-06].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108/c1006-31444693.html>.
- [2] 邵安伟,王军利,张松奎. 青少年儿童超重与肥胖的流行、成因及其风险[J]. 体育学研究, 2019, 33(5): 87-94.
- [3]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N]. 人民日报, 2021-07-25(1).
- [4] 王梦茜. 课后服务“双减”中的一道重要“加法”[J]. 教育家, 2021(36): 12-14.
- [5] 廖宇清,黄建云. 上海“双增双减”政策内涵与实施[J]. 规划师, 2015, 31(S1): 52-55.
- [6] 赵亚丽,杨继奎,尚坦. 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实施现状与发展建议——以河南省许昌市为例[J]. 基础教育参考, 2019(21): 15-18.
- [7] 人民日报.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女性就业者占比超四成[EB/OL]. [2019-12-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582994251848650&wfr=spider&for=pc>.
- [8] 马健生,邹维. “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J]. 教育研究, 2019, 41(4): 118-125.
- [9] 刘文,林爽,林丹华,等. 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基于评估及预防视角的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6(4): 94-105.
- [10] 朱焱,于文谦. 我国公共体育资源区域差异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3): 78-87.
- [11] 屈璐. 我国基础教育课后服务政策嬗变及展望[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9, 43(4): 14-19.
- [12] 张翼,黄晨琳. 学校课后服务:收费抑或免费——基于理论和政策文本的分析[J]. 教育导刊, 2021, 39(2): 26-32.
- [13] 陆俊堂. 广东省乡镇小学课后体育服务实践运用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14] 武欣. 小学教师校内课后服务现状及改进策略[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20.
- [15] 规划司.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 [16] 央广网. 上海:多渠道解决中小学体育教师不足问题[EB/OL]. (2020-01-17). <https://baby.sina.cn/baike/2020-01-17/detail-iihnzhha3002702.d.html>.
- [17] 庞威. 英国课后托幼服务述评[J]. 上海教育科研, 2008, 24(10): 32-34.
- [18] 贾利帅,刘童. 北欧四国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实践、特征及启示[J]. 基础教育, 2021, 18(4): 103-112.
- [19] 张忠华,李玲. 澳大利亚学龄儿童课外看护服务及启示[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 37(9): 19-26.
- [20] 陈清. 基于教师职业定向的湖北省退役运动员发展对策研

- 究[D]. 武汉: 武汉体育学院, 2021.
- [21] 人民网. 体育教师队伍严重紧缺 全国缺口高达45万[EB/OL]. [2013-11-11]. <http://edu.people.com.cn/n/2013/1111/c1053-23496936.html>.
- [22] 徐正旭, 龚正伟. 当代我国体育教师“污名化”现象分析[J]. 体育学刊, 2018, 25(5): 89-94.
- [23] 隋志乐. 哈尔滨市南岗区小学校内课后体育服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
- [24] 李春桃. 8-16岁学生体育课伤害事故的特征及预防措施[D]. 重庆: 四川师范大学, 2020.
- [25] 张晓波.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9(6): 91-93.
- [26] 李建军. 中小学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问题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0(2): 80-84.
- [27] 熊熊, 刘宇佳. 美国中小学课后教育的兴起之路、发展之困与经验之谈[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 30(6): 81-86.
- [28] 屈璐. 日本课后服务的路径与机制研究——以牛久市学社合作模式为例[J]. 现代远程教育, 2019, 41(2): 64-70.
- [29] 余霞. 武汉市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30] 王健, 陈元欣. 我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现状、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5, 39(2): 86-89.
- [31] 于文谦, 季城. 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中考的热效应与冷思考[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3): 360-365.
- [32] 李长宁. “家校社”背景下杭州市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D]. 沈阳: 沈阳体育学院, 2021.
- [33] 黄谦, 熊优, 崔书琴, 等. 社会支持、退役准备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19-29.
- [34] 马开剑, 王光明, 方芳, 等.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生态变革(笔谈)[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8(6): 1-14.
- [35] 董艳梅, 朱传耿. 青少年课外体育运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兼论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6): 52-62.
- [36] 刘欣然, 黄玲. 动静的争辩: 学校教育中的身体规训与体育挽回[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1): 30-35.
- [37] 刘欣然, 张娟. 生命的记忆: 童年消逝的文化危机与身体教育的哲学拯救[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4): 33-38.
- [38] 专家组. “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发展[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11): 1-15.
- [39] 陈志霞. 知识员工组织支持感对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的影响[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40] 韩宏宇, 郑家鲲. 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内涵、困境及实现策略[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75-82.

作者贡献声明:

李彦龙: 设计论文框架, 撰写论文; 常凤: 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Timeliness and Guarantee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asing the Academic Burden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LI Yanlong¹, CHANG Feng²

(1.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rbin Sports University, Harbin 150008, China; 2. Institute of Sports Human Science, Harbin Sports University, Harbin 15000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new guidance has been issued to ease the academic burden and standardize the after-school progra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fter-school program. Therefore, it should be given its due. This paper uses “subject, object, content and means” as the main logical line, analyzes the multiple logic and realistic dilemma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taff shortage affects the subjects supply, the sports safety concerns restricts the objects participation, the single content blocks th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 limited means of support hinders the social connection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alize the support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clear the obstacles for the effective supply, promot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object to provide behavioral motivation for the participation, enrich the content system to create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means of support and provide key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Key words: easing the burden of excessive homework and off-campus tutoring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tudent fitness